
見證兩個時代的花蓮人

——楊總賢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沙妮樺*

記錄：沙妮樺

時間：2018年4月16日、5月17日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魚心日式料理、金品茶樓

楊總賢先生出生於1933年（昭和8年）花蓮港廳吉野庄的吉野村中園區（今花蓮縣吉安鄉）。父親楊壽是吉野病院的醫師，全家人住在病院的宿舍中。從小和吉野村的日本人一起長大，因此戰前他只會說日文並不會說台灣話。1941年就讀吉野國民學校一年級，戰後日本小學校關閉，而後轉學到明義國民學校（原本的昭和公學校）讀完六年級。

1946年接著考初中，進入省立花蓮中學初中部和高中部共六年的中學生涯。期間經歷了國民政府接收花蓮，日本人的離台以及花蓮的二二八、花東大地震。花中畢業後，考上師大美術系。隔年，1953年他離開花蓮重考上淡江英專，最後皆因父親反對而沒去就讀。1954年當兵，1955年退伍後由父親的安排進入新光紡織工作。

*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大三學生



位於中間者為受訪者楊總賢先生，拍攝於公司尾牙。筆者母親提供

一、家庭背景與我的父親

我出生於 1933 年花蓮港廳¹ 吉野村² 中園區³ 的吉野醫院⁴。我

- 1 花蓮港廳是台灣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劃之一，設立於明治 42 年（1909），台灣原有之二十廳廢止合為十二廳之際，將東部之台東廳分為台東、花蓮港兩廳，直到 1945 年改制為今花蓮縣。花蓮港廳下設有三支廳、二街庄、七區。吉野村位於花蓮支廳的吉野區，今花蓮縣吉安鄉。
- 2 吉野村，是台灣第一個官營日本移民村。1909 年七腳川事件之後，政府沒收了七腳川社的土地。明治 43 年（1910）設置移民指導所，建立吉野移民村，並陸續設立宮前（今慶豐村）、清水（今福興村）、草分聚落（移民最初收容地，今永興村及一部分稻香）三個聚落。張永照等口述，張宏婷等採訪編輯，《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花蓮縣吉安鄉：台灣行動研究學會，2017），頁 58。
- 3 中園（今吉安村）為吉野村的行政區，官署的所在地也是交通樞紐，《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頁 47。於宮前和清水聚落的中間，含學校、郵便局、庄役場。《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生活紀事》，頁 23。
- 4 昭和 5 年（1930）8 月 11 日，設置吉野醫院，建築物三棟，包括一般治療及助產。林裕勳〈日治時期花蓮港廳吉野村清水部落之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3），頁 116。昭和 8 年（1933），



吉野醫院。是訪者楊總賢阿公的家。翻拍自《灣生回家》由清水半平的孫子清水一也提供之照片

爸爸是院長的助理。我的爸爸在 1908 年出生於新竹州，1920 年國小畢業之後全家遷到當時還在拓荒開發的東部。爸爸原本是在漢方藥店的包藥小弟，十四歲之後開始到日本人開的醫院裡幫忙打掃打雜。醫院裡面的日本人醫生看我爸爸日文說的還不錯是個有潛力的小伙子，就開始教他一些醫療相關的知識和技能。1930 年代，吉野村的村長清水半平⁵先生認為我爸爸是一個認能幹的

吉野村產業組合成立醫院，正式成立了醫療機構，藥費半價，有困難者免收，醫師改為公醫，解決居民無錢看病的窘況。翁純敏，《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花蓮市：花蓮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2007），頁 66。

5 清水半平（1890-?）1911 年 21 歲的清水半平初抵花蓮港。他從農夫身

人，就把他介紹到吉野醫院工作。院長是一位琉球人，原本在中國從軍，在戰爭中失去一條腿後輾轉來台灣的醫院工作，我爸爸是他的助理要協助他做許多事，院長也會教他很多的醫療技術，注射打針和用藥等等，院長賞識他，所以買了很多醫學的書給他看。醫院裡面還有兩位助產士，就是台灣話俗稱的「產婆」。日本時代的產婆地位很高，護士的上面是產婆，產婆的上面就是醫師。大家都住在醫院的宿舍裡，他們就住我家隔壁。

清水半平先生非常照顧我們家的人，他的性格很好，是很有學養的日本人。他的兒子在台北帝大念書的時候，偶爾放假、寒暑假回家，會來教我爸爸讀外文的醫學書，那個時候很多醫學相關的書都是德文的，我爸爸只有小學畢業，沒有念中學也沒有讀醫學校，所以看不懂外文的醫學專有名詞，都是其他日本人醫生還有清水半平先生的兒子教他讀的。

二、吉野村的童年

清水先生在村裡經營吉野郵便局，我小的時候常常去他家玩耍。我記得清水太太很胖所以有高血壓的毛病，日本人當時只有一個辦法，半平就會叫我們去溪邊抓水蛭，然後他們會拿一個臉盆裝水，清水太太腳先泡進去，再把水蛭放進臉盆裡開始吸血，

分一躍成為會計兼移民管理人員；隔年還被任官，成為官吏的一員。直到1913年就任吉野郵便局局長，當時二十三歲，也擔任吉野村第三任以及第四任村長。《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頁47；田中實加，《灣生回家》（臺北市：遠流出版，2014），頁199。



清水半平家族與須田家族的合影。前排左三為清水半平，前排右二為清水太太。後排左三、四為清水半平的大兒子和小兒子。左一為媳婦清水靜枝，抱著清水一也。翻拍自《灣生回家》，清水一也提供之照片

我當時看了好怕喔，半平說「你不要看，不要看，你們小孩子不要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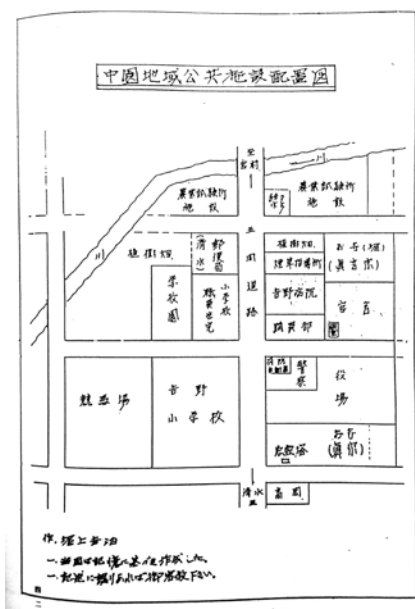
當時缺乏治療心臟的藥，他們的做法是要放血的意思，泡半個小時之後起來洗腳，水蛭全部都黏在清水太太的腳上不動。吉野醫院的院長也說沒有關係，傳統日本的漢醫就有這種治療法。戰後，我去有去日本找他們，清水太太還記得當時的情況，她說：「那個時候就是叫你們去抓的水蛭，所以我現在還在活命，

還沒死，就是你們幫的忙。」

我家在中園，宮前與清水聚落的中間。斜對面就是販賣部⁶，還有警察局、郵便局、消防隊、醫院，都在這裡附近。我們家有六個小孩，我是老大，有四個弟弟一個妹妹。從小我就在吉野村長大，和日本人一起生活，所以我不太會講台灣話，是說日文長大的。昭和15年（1940年），我開始去吉野小學校⁷附設的幼稚園上學。八歲的時候，昭和16年（1941年）上小學一年級，由於發布新的教育令⁸，學校改名為吉野國民學校。我們班只有我一個台灣人，其他都是日本人。雖然我也是講日文，但其他同學也都知道我是台灣人，還有一些不愛念書的流氓小孩會罵我是「清國奴」。我回去馬上跟爸爸報告，還好我爸爸跟校長是一起喝酒的好朋友，被他知道那些小孩罵我清國奴之後，爸爸請校長幫忙處理，結果隔天校長就拿木刀修理他們，讓他們學到教訓，下次不敢再罵我。之後校長就建議我們家的人改個日本名字比較不會

-
- 6 大正9年（1920）7月20日，成立吉野村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林裕勳〈日治時期花蓮港廳吉野村清水部落之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3），頁P116。
 - 7 明治44年（1911）荳蘭尋常高等小學校開始招生。要招生對象為日本移民子弟，2月20日開學，但開學沒多久就被一民原住民縱火燒毀，4月5日另外覓地在南園附近興建，在移民村命名為吉野村時，於11月5日重新改名為吉野尋常高等小學校。昭和16年（1941）4月1日改名吉野國民學校，就是現在吉安國小的前身，《吉野移民村與慶修院》，頁58。
 - 8 1941年3月發布《國民學校令》（昭和16年勅令第148號）。1937-1945年此時期的教育政策則為：強化社會教育工作，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1937年廢止公學校漢文科及漢文書房、1941年公佈「國民學校令」以及廢除公學校及小學校之分軌學制。王錦雀，〈日本治台時期殖民與教育政策之演變〉，《公民訓育學報》，期11（台北，2002年2月），頁152。

被其他日本人欺負，校長幫我取名為神山賢一，他說神山是日本的富士山，所以是很不錯的名字。而我爸爸漢名是楊壽則改為神山真壽。並不是所有台灣人都願意改日本名字，像我這種有一半台灣一半日本文化背景，會講日語的家庭才會改，其他台灣人他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是漢人，就不願意改，還有一種是他們沒有權力改。但像我這種有改日本名的人，戰後就會被其他台灣人罵「四腳仔」⁹。



中園地區公共設施配置。翻拍自《吉安鄉志》。此圖的上方為往宮前聚落的方向，下方為往清水聚落的方向。在中央五間道路（今吉安路）的左邊由上而下可以看見清水先生經營的郵便局和吉野小學校；右邊有吉野醫院、販賣部和警察局

9 台語四隻腳之意，用來辱罵他人為非人類的牲畜類。

吉野國民學校

我國小時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被大我兩歲的五六年級流氓小孩四個人，他們看我是台灣人就要欺負我還要打我，結果被旁邊認識的鄰居看到，他趕快去報告校長。隔天早會校長把欺負我的人一個一個叫出來到升旗台前，要他們跪下，並且對他們大聲訓斥：「你怎麼說他是台灣人呢，人家叫作神山賢一。你們怎麼可以這樣欺負人呢！現在日本在跟美國、英國的敵人打仗，日本很辛苦你們知不知道，怎麼自己不會團結，還在欺負人家。」那幾個日本學長嚇得直發抖以後見到我就不敢再靠近了。

當時已經是戰爭的時候，學校的上課內容有國語、歷史、地理都有，和現在我們台灣的國小差不多，我們台灣的國小是學日本人的教育方式，日本人又是學西洋人的。國語課就是學日語，歷史、地理都是學日本的東西，沒有台灣的內容，這樣也是很莫名其妙，但是大人就會跟我們說：「聽！聽就是了，相不相信是你的事」。平常我們一定要練習寫毛筆字，音樂課的時候要唱歌，還有體育課的時候要學柔道和劍道。我們那個時候男生都要學劍道，老師會做一個人型，上面貼外國人的臉，一個一個外國假人，我們就用木刀赫赫赫一直劈砍，要練習打外國人。

三、戰火無情：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

我小學三年級之後，由於戰爭越來越激烈，美軍開始對花蓮

地區空襲。那時候花蓮有兩個機場，北部和南部機場，南部的就是南埔機場¹⁰。我們早上要躲空襲不能上學，老師會交代明天傍晚什麼時候在學校集合，當時是夏天，天色比較不會那麼快變暗，老師就帶我們去機場做勞動。因為早上美軍趁日本兵離開時，轟炸軍用基地的南埔機場，飛機的跑道變得一個洞一個洞坑坑巴巴的，這樣飛機沒有辦法起飛和降落，所以老師要我們小孩子幫忙搬石頭把坑洞補起來。我當時國小三年級學校不能讀書，那時候我們只敢晚上出去，也沒有手電筒。空襲之後晚上我們會用竹子綁一綁沾石油做成火把，我們小孩子就要搬旁邊的石頭把洞填起來，小孩子就要做這種辛苦的工作，真的是很可憐。夏天那邊毒蛇很多很危險，我那時候沒有鞋子穿，沒有配給生活用品，連衣服都破破爛爛的，幾乎所有可以用的東西都被軍隊沒收了。

困苦生活

戰爭爆發後，鐵、金屬、銅他們做砲彈用的都被軍隊徵收走了。檢查很嚴格，警察來家裡看到你還有鋁的臉盆就說：「不行喔，鋁要做飛機用！」軍隊徵收了鐵門、鐵窗、鍋子、刀子、鋁製的臉盆、銅製的項鍊，最後甚至是鐵釘也被收走了，我們只能

10 花蓮港南飛行場，今花蓮空軍防空學校一帶，《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頁23、29。花蓮港廳有南北兩個機場，一是北埔機場建於1936年，即今花蓮機場，二是南埔機場，南埔機場拆除後，在知卡宣森林公園裡面保存一座停飛機所使用的掩體壕，旁邊的南埔苗圃則有兩座，這三座掩體壕是目前南埔機場所僅留的面貌，資料來源：更生日報（<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detail/0000564382>，截取日期：2018/6/28）

用木頭自己再做臉盆和一些生活用品來補救。我只知道他們徵收金屬是用來做武器的，銅鐵可以做砲彈，鋁是用來造飛機的材料。

當時的食物是用配給的¹¹，卻很不公平。當然日本人一定是優先配給，雖然應該按照家庭人數多少而配給多少，但是有一些人會拿錢賄賂負責配給的人，分到多一點的糧食，之後被警察發現，就常常來檢查他們有沒有按照規定分配，警察說一定要按照規定分配這樣才公平，食物分配的事情應該要很嚴格執行，因為這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其餘的台灣人不一定能拿到配給的米，但是台灣人自己會種地瓜和其他作物，至少還有東西可以吃。

家庭變故

我三年級之後，空襲越來越嚴重，學校就停止上課了。因為學校大型的建物，像是禮堂，美軍就會以為是軍隊，然後用炸彈轟炸。我就待在家裡一年多不用去上學。戰爭結束的前兩年，我爸爸剛通過國家考試拿到實習醫生的資格就被軍隊徵招到海南島去當軍醫。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的媽媽因為心臟病過世了，爸爸被徵招之後我們家的小孩子沒有人照顧，還好爸爸有八個兄弟，他排行第四，我們小孩子就被分到不同的叔叔伯伯家，按照順序我被分到大伯家，二弟被分到二伯家依此類推。沒多久我的三伯在海邊發生了意外，落海之後失蹤了找不到遺體。我的三

11 1943年12月日人公佈臺灣糧食管制令，次年設立臺灣糧食營團，接辦配給機構之配給業務。由於日人配給分等級亦不公平，那時日本警察查緝私宰很嚴重。林炬壁著、姚誠、張政勝編，《花蓮講古》，〈捉閻（亞米）活活被人打死〉（花蓮市：花蓮市公所，2001），頁197。

伯母獨自一人沒有錢撫養她四個孩子，就決定搬到我們家，用我爸爸的薪水養所有小孩，包括她自己的小孩有我的四個堂兄弟和我們家的六個小孩，所以我們家六個小孩又搬回家住了。當時管理醫院宿舍的日本人也幫我們安排了一個大通舖，可以住十個小孩，他們日本人也覺得由三伯母照顧我們這些小孩子是好事，至少還可以有人煮飯和打理家務。

小學校與公學校

在十個小孩之中只有我是讀日本人的小學校，其他兄弟姊妹都是讀田浦公學校¹²和其他台灣人以及原住民一起念書。小學校裏頭的日本老師都很嚴格，只要學生不聽話，頑皮搗蛋就會被老師修理。老師會把同學叫到黑板前面的講台，在大家面前當眾打兩記耳光，被打的人也不敢哭，實在很可怕。我沒有被老師打過，因為我還蠻乖的會聽老師的話，老師也知道我是台灣人，是醫生的小孩，而且我的爸爸跟校長、村長都是好朋友，所以好像也不太敢打我。

我讀的小學校都是日本人老師，其他我的兄弟讀的公學校就有很多台灣人老師，可是大家都是一樣用日文教學的，當時的教育就是這樣，不管是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都是學日文，然後才可以彼此用日文溝通，一直到戰後私底下我們都還是用日文在

12 今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小。初為1900年設之臺東國語傳習所薄薄分教場，1905改為薄薄蕃人公學校。1927年校舍由薄薄社遷至荳蘭社。1937年改稱田浦公學校（荳蘭改名為田浦）。1941年改為田浦國民學校，戰後改為宜昌國民學校。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吉安鄉志》（花蓮縣吉安鄉：吉安鄉公所，2002），頁519-520。

聊天的，甚至是中學畢業之後的同學會，我們見面還是講日文。

不用上學的日子

因為戰爭的關係我們有一年多快兩年的時間不用上課，我常常和弟弟跑去河邊釣魚、抓水蛙，看到有別人種的香蕉樹和木瓜樹就偷偷摘一些回家，戰爭的時候什麼物資都很缺少，只要是好吃的我們都會去抓去拿。我記得昭和 20 年戰爭結束前，有一次我和弟弟要去山上的溪邊抓魚，在那邊突然有很多子彈往我們的方向掃射，我當時嚇得跳起來，以為我們已經死了，回過神來才看到是一架美軍的戰鬥機剛剛從我們的頭上飛過，他應該是看到有人在動就往那個方向掃射了兩三槍。我們本來以為躲過一劫，結果那架美軍的戰鬥機又朝我們的方向盤旋回來，他應該是看到我們是兩個小孩子，這次他飛的更低了一點，那個美國飛行員一直向我們揮手示意，意思要我們不要待在這裡趕快離開很危險。我弟弟也說他有看到那個飛行員一直對著我們招手，我們兩個都看到了，就趕快跑回家不要在外面亂晃。我們長大一點之後想起這件往事，我覺得美國軍人還是有人道精神的，他至少會放過無辜的小孩。戰後，聽花中的同學說美軍的飛行員，可能有資料可以查得到是誰，但是我們的線索太少了，還是沒辦法查到。我和弟弟至今仍然默默地感謝當年的那個美軍飛行員，他真是一個好人，在混亂的戰爭時期我們可以遇到這樣的好人可以說是非常幸運了。

四、終戰後的台灣

1945年的夏天戰爭終於結束了¹³，日本天皇廣播說我們戰敗了，他也一直安慰在海外的日本兵，要他們不要再造反並且要聽盟軍的指揮。日本戰敗，大家也比較安心一點了。幾個月後最先來台灣的不是美軍而是中國兵先來了，他們叫日本兵把槍都交出來，那個時候的中國兵，軍車上戴著鍋子，他們也沒有軍鞋，穿的是草鞋，頭上戴著斗笠，胸口背兩排子彈，跟我們小的時候看的漫畫裡面的中國兵一模一樣啊，好丟臉喔。他們把日本兵的武器沒收之後就把他們關到學校的教室裡，之後日本的軍人就被抓走了不在花蓮，去另外做工，他們被分配去修復戰爭時被炸壞的公共設施，像是港口之類的地方，日本兵就被當成奴隸一樣要做苦工，由美國兵和中國兵監督¹⁴。

13 日本於昭和20年(1945)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民國三十四年(1945)10月25日台灣光復。1945年11月9日張文成率領隨員王冬波、李堅守、黃海清等接管花蓮港廳。《花蓮講古》，〈光復那一年的往事〉，頁176。接收工作一直到民國三十五年(1946)1月10日才告一段落，花蓮港廳長加藤重喜離開台灣。1月11日花蓮縣政府成立。《花蓮講古》，〈戰敗日僑衣縫藏黃金〉，頁126。

14 1945年10月30日警備總部以11月1日開始的軍事接收發布軍字第1號命令，要求在臺日軍各部隊向國府指定之地點人員，移交軍事裝備、軍用物資與文書圖表，因在臺日軍歸國時期未定，故移交時准予保留三個月份的糧食與隨身防寒被服。日軍繳械後之工作，應以打撈沉船修造船舶、清掃水雷地雷、營建房屋、恢復陸上交通、工礦生產為主，以製造鞋襪、種菜、飼養家畜為副。張瑞成編輯，〈中國臺灣省警總司令部命令軍字第1號〉，收於張瑞成編輯，《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246-250。

滯留台灣的日本人

戰後的日本人不能住在自己原本的房子裡，會被趕出去，他們看到中國兵來了就怕死了，中國兵就像強盜一樣會沒收這個沒收那個，沒有政府的管理，日本人都很怕。日本人的土地和住宅都被接收的公家機關沒入，作為區公所或是分配給其他的機關，不是私人運用的財產。

所以我當時都要說：「我是台灣人喔，不是日本人。」他們都會問：「你是日本人嗎？日本籍嗎？」或是查看戶籍謄本，是台灣人就放你走。當時還有美國兵在管理，官兵盤查還可以公平進行，至於中國兵只要有錢就好了。中國兵看到人就會調查，你是哪裡人，是台灣人就放你走，是日本人就倒楣了。他們會到處用威脅恐嚇的方式搶走日本人身上值錢的東西，只要是在路上遇到中國兵像是金子、戒指、項鍊、手錶之類的東西都會被拿走。

戰後是美軍會用船把在台灣的日本人送回去，在花蓮的日本人民被集中到港口附近的學校安置，像是在花中的禮堂、教室裡面都是日本和其他美崙的小學、港口旁邊的小學教室都是擠滿日本人，他們也不能住在自己家裡，會被趕出來，那個時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一方面是這樣比較方便，能更快速地把他們送回去，因為不是一次就能全部送回日本，一定是分批，蔣介石和陳儀一直講要分批分批，從基隆、高雄回去的，還有從花蓮港回去的，所以他們不能馬上回去，也沒有辦法回去，因為沒有船。

日本人需要在離港口比較近的地方等船來把他們接走，另一方面是要保護那些日本人的安全，讓他們不要再被中國兵搶走東西，學校的外面會有美軍拿槍駐守，才能保證日本人的安全。當

時花中的禮堂就安置了很多日本人，之後輪到我吉野國小的同學要坐船回去了，我當時在花中念書，港口就在花中下面，我有跑去花蓮港送他們。他們其實都知道我是台灣人，只是不敢講而已，他們也沒有說什麼，我們彼此相互抱一抱，就說再見了。那個時候我們都是十幾歲很年輕，還是很有感情的。

現在回想起來日本人有好人，也有不好的人。有一些以前住在吉野村的日本人在戰後我們一直都還有聯絡，像是吉野小學校的兩位老師，過年的時候還會打電話給我，問我過的我好不好。還有小學同學，我們在 2008 年之前都一直有舉辦吉野國小的同學會，一年辦在花蓮，下一年就辦在日本，在台灣和日本輪流舉辦。我都有去參加同學會，只是現在很多吉野村的人和我的同學都已經走了，我們也就比較少聯絡，我們也不敢打電話聯絡，很怕又接到誰過世的消息。

新生活

戰後日本人讀的吉野小學校就關門了，我轉學到原本的昭和公學校¹⁵讀小學六年級，是原本台灣人讀的學校，戰後改成中國名字叫做明義國民學校，原本還有另一所明治公學校改成明禮國民學校¹⁶。學校的人知道我是從日本學校轉來的台灣人，那個時

15 1933 年花蓮公學校分教場，1939 獨立改名為昭和公學校。

16 1897 年設立，當時的名稱為臺東國語傳習所奇菜分教場，當時是日本人為了培育種子老師才辦理學校。1905 年臺東國語傳習所奇菜分教場更名為花蓮港公學校。1933 年設新港分教場於農業補習學校舊址。1939 年改名為明治公學校（今花蓮市明禮國小），分教場獨立稱昭和公學校（今明義國小）。資料來源：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7/pasta/A/hualien_09.html，截取時間：2018/6/15；明義國小網站：<http://>

候我真的好慘，台灣話¹⁷也不太會說只會說日語就一直被人家罵是「四腳仔」就是在說我是日本人的狗的意思。讀了一年畢業之後，我就要去考初中。

戰後初期的花中

戰後的第一年，花蓮中學¹⁸入學考試的考卷上還有日文的題目可以看，有日文版本和中文版本的，我們也可以選擇用日文或是中文來回答問題¹⁹，我用日文回答結果還考了第三名，入學

www.myps.hlc.edu.tw/modules/tadnews/page.php?nsn=1566，截取時間：2018/6/15)

17 文中的台灣話即閩南話。

18 1936年(昭和11年)6月5日，也就是「台灣教育令」公布後14年，才准予設立專門招收男生的中等學校，花蓮中學焉於產生。雖然花中成立時，依據的是台灣總督府於1933年(昭和8年)頒布的「台灣公立中學校規則」，但成立之初的第一屆學生手冊及成績紀錄簿載錄的校名是「聽地方費立花蓮港中學校」直到1937年才改名為「聽立花蓮港中學校」，這說明了花中的設校，確實是在地方殷切的期盼之下，由民間集資成立的，可算是東台灣第二所中等學校。〈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校發展之研究〉，頁11。1945年(民國34年)臺灣光復，校名改為臺灣省立花蓮港中學，設有初中部與高中部。1946年改為臺灣省立花蓮中學。1968年配合政府延長國民教育，停招初中部，1970年正式更名為臺省立花蓮高級中學。2000年定名為國立花蓮高級中學。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8A%B1%E8%93%AE%E9%AB%98%E7%B4%9A%E4%B8%AD%E5%AD%B8>，截取時間：2018/6/26。)

19 徐兆松校友就指出：「初一入學考試，語文是中文翻日文，日文翻中文，就好像現在的大學畢業生考留日時的語文考試一樣，恐怕我們的前、後期同學們都沒有這種經驗吧！」葉日陞〈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校發展之研究(1936-2002)〉(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5)，頁42。

註冊以後，福州籍的老師還特別找我，他說：「那個姓楊的楊總賢，就是你喔，怎麼日文那麼好呢？」我只會日本話，台灣話也講得不太好，他就笑我說：「趕快學喔！趕快學喔！你不是日本人這樣不行喔！」那個老師在我讀初中和高中六年中就特別照顧我。戰終後的第一年，花中的入學考試還有日文的題目可以看，應該是因為那個時候還有日本老師因為要交接學校工作而留下來，做行政人員，他們也是陸陸續續等船來接他們才能回去，我們也都會去港口送他們。戰後花中還有留用一些日本人在學校，我記得還蠻多的，日本老師大部分不是負責講學的老師，像是日本的體育老師是用行動告訴你如何動作，我的游泳老師就是日本人。我是花中的游泳選手，體育課我們在花中的游泳池練習，我就在當時中學的游泳比賽得了第一名。

很多新老師是戰後從日本回來的台灣年輕老師，而外省籍的老師比較少，就是校長，學務長、教務長、國文老師這些人。外省老師大多會是福建的福州人教國文，他們會說福建話也聽的懂北平話²⁰，可以把校長或其他長官的話翻譯成福建話給我們聽。我們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客家人、三分之一的人是原住民，其他是閩南人，還有一個外省人，而全校也只有兩個外省學生。戰後的花蓮還是受日本文化影響比較深的地方，其他的外省人不太敢來，他們覺得可能會被欺負。我們班只有一個外省人，他的爸爸是一間公司的老闆，但他是個乖乖的學生，有的時候反而會被班上其他的同學欺負。

20 文中的北平話、中國話即今日的國語；北京話。

花蓮的二二八

我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台北爆發了二二八事件²¹。二二八的時候花中校長是中國人，第一代校長林民和，²²他是福建人。台灣人那個時候要抓外省人，他跑掉了我們来抓他。從二二八事件之後校長就不見了，校長宿舍也關門了。學務長和教務長也不見了，學校裡面都是台灣人，那個時候中國人的學生有兩個，我們班那個公司廠長的兒子也不見了。當時花蓮港旁邊有日本時代飛機原料的鋁工廠，中國人來接收之後要繼續做這種行業但是日本技師回去了，他們就不會做了，所以他們請了新的廠長來接管做其他的工業生產²³。我們班的外省人同學就是那個廠長的兒子。

-
- 21 1947年2月27日，臺北因查緝私菸，長官公署處置失當而引爆二二八的抗爭。國民黨政府不顧台灣民意，反而視民主改革為叛亂，將參與民眾視為暴民。當時身兼國民政府主席、國防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國民黨總裁的最高權力者蔣介石下令派兵來台鎮壓，造成台灣菁英與民眾死傷慘重。三月八日國民黨軍隊登陸基隆後，立即進行逮捕槍殺的鎮壓行動。西部情勢稍緩之後，軍隊在四月一日開抵花蓮，隨即在祥和的東台灣進行一場慘絕人寰的家門屠殺。張炎憲、曾秋美，《花蓮鳳林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4），頁9。
- 22 林民和，台灣光復後花中花中第一任校長，任期1946-1948年。福建龍岩人，國立廈門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民國35年4月到任，37年8月離職。到任時28歲，為建校至今最年輕的校長。〈國立花蓮高級中學學校發展之研究〉，頁50。
- 23 今台肥海洋深層水園區。1939年日於此設立日本鋁（アルミ）業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場，憑藉木瓜溪水利發電與鄰港地利之便發展軍需工業。1945年被炸毀的花蓮港工場收歸國營，隸屬台灣鋁業公司。1952年為以農業創造台灣經濟奇蹟，前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決定撥交台灣鋁業公司花蓮廠，指定台灣省屬高雄硫酸銨公司於此籌建花蓮鉬肥廠生產化肥。資料來源：台肥海洋深層水園區網站（<http://www.twdpark.com/ml/>）

台北二二八事件過後的第四天，學校下課的時候，我騎腳踏車從學校回家一定要經過軍營，中國兵就說：「小孩子下來！」，我心裡想「爲什麼要下來？」他們有真槍實彈就對著天空鳴槍，他說下來我也只能下來。他說：「你的腳踏車國軍要徵收，你們小孩子回去」。我和他說：「我自己的東西爲什麼要給你？」，心裡想日本兵都不敢這樣。可是不聽話他就會打你，把你打到流血，我有很多同學被打到流血，他把槍拿出來，我們就不敢反抗了。再加上那個時候我們也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他們就很兇地把槍拿出來，我們只好趕快跑掉，所以我們都很討厭中國兵。我的腳踏車被國軍搶走之後，我去警察局報案，那邊的基層警察是花蓮當地人，他們和我說：「算了吧！算了，我們也沒有辦法幫你備案」，因爲那些國軍也算是他們的上級長官，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幫我。

日本時代的學校倉庫裡面還有以前軍訓課留下來日本兵的步槍，是真的可以用的步槍，但是沒有子彈。我們學校留下很多。快畢業的前輩跟大家說把步槍拿回去，拿回去打中國兵。我那個時候也拿了一把槍，但是跟我比較好的前輩說：「你不要用！很危險！」它沒有子彈，可是拿回去人家反而會打你，因爲他們會以爲是真槍。

當時候有學生代表被抓去，花中兩個，花蓮女中兩個，被關了兩年回來沒有被槍斃，但有很多花蓮人都被槍斃了。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前當過日本兵回來的人，被中國兵看到，他就說：「抓到了！抓到了！要槍斃囉」，當時的花崗山廣場就有很多人被叫

去看槍斃的情形，尤其是以前原住民的日本兵被槍斃的特別多，因為他們不會講台灣話都講日語。

那個時候花蓮比較日本化，有原住民在，大家都喜歡講日文，跟原住民只能用日文溝通，要不然講不通啊。中國人不喜歡我們講日文，但不講日文又無法溝通，被中國人抓到了就槍斃了。中國兵看到人家的腳踏車就沒收，說軍隊要用；去市場的豬肉攤，通通以軍隊徵收為名義不付錢。他們說：「國軍也要收錢，槍斃！」這個國軍要徵收，那個國軍要徵收，所有東西通通都要徵收。不管怎麼樣都是要聽他們的話，就像佔領軍一樣，來台灣說是祖國的軍隊，他們應該安慰被日本人欺負的台灣人才對，但他們卻把台灣人當作敵人一樣。市場所有的東西都說國軍要徵收，那時候不到兩天大家都不敢開店了。所以二二八事件就是這樣發生的，台灣人起來反抗，對抗中國兵。

二二八事件之後，當時的花蓮縣長候選人張七郎²⁴有來我們學校演講，他是鳳林的客家人醫生，在花蓮非常的有名，他也是

24 張七郎(1888-1947)生於滿清統治時代，在日治時代成為台灣菁英，來到花蓮鳳林開疆闢土，寫下動人的開拓者事蹟。隨著時代的轉變、視野的擴大，張家人壯志飛揚，宗仁、依仁、果仁三兄弟到日本讀書、到滿州創業，象徵台灣人的腳步已非侷限台灣一隅，而是拓展至東亞。日本戰敗，國府接收之後，張七郎成為台灣耀眼新星，可惜在二二八大屠殺中父子三人殞落。張七郎在終戰初期寫下許多慶賀的文字，並籌建磚造牌樓，顯見歡欣鼓舞的心情。這正是當時許多台灣人的寫照，希望奉獻己力，建設台灣，於是許多人參與公共事務、投入選舉，企圖改造台灣。張七郎則為爭取鳳林更好的教育環境擔任鳳林初中的創校校長，同時為花蓮縣參議員，並被推選為議長以及制憲國大代表。於1946年11月上旬前往南京參與制憲國民大會，1947年1月中旬回台。《花蓮鳳林二二八》頁8、頁20-21。

受日本教育，所以當時他是用日文演講，校長聽不懂張七郎的演講但是他知道是在講政府的壞話，所以就告訴其他的人。張七郎先生說：「台灣人站要起來，不要給中國人欺負。」他一直講民主民主，我們不要被奴役，不要被人家管，我們都是可以選舉，我們都是可以作主。²⁵ 我非常的尊敬他，我們花中的同學會時，還去過他的墓上香，大家都很感動。他一直說民主民主，但是蔣介石那個時候不允許民主，所以他最後被槍殺了。

五、花蓮中學的青春歲月

戰後，花中就交由中國來的老師管理，校長、教務長還有幾位行政人員是外省人，他們講北平話，我們其他的台灣人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客家人、閩南人、原住民我們都是用日語溝通，私底下也還是用日語在聊天。花中台灣的老師很多，學校的校醫、體育老師、音樂老師、算數老師很多都是戰後從日本回來的大學

25 筆者未能提出史料證明張七郎在二二八事件後曾經去過省立花中演講，並且符合訪者所描述的內容與情形。因此，此段內容仍需保留查證，或其可能為受訪者誤記了某段記憶。可從其他張家人的訪問紀錄中找蛛絲馬跡。依照受訪者的描述時間可能為張七郎從南京回來後，經歷二二八，至其遇害之前。張依仁在訪問紀錄中提及：「阮老爸對國民黨應該是有期待的，不然在日本時代，有誰敢把蔣介石騎馬的畫像掛在房間裡？那時有很大的期待，可是後來，他應該是失望了。四月初四發生事情前一日，晚上閒閒地，阮老爸在寫大字，就寫個『台灣暗復』給我看。台灣是『暗復』，不是『光復』。不只他，我也失望。」由此訪問紀錄中可見張七郎從原本對於國民黨政府的積極認同，變為失望。然而其中並未提到張七郎要台灣人民起來反抗的意象，因此可能為受訪者加入其他記憶，或仍有待保留查證。參考《花蓮鳳林二二八》〈張依仁訪問紀錄〉，頁 62。

生，他們是花蓮出生的台灣人，回到花蓮當老師。

上學的時候我們每天都要升旗，然後要學三民主義的時候要唱歌，但是我們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花中的台灣人老師教課會偷偷講台灣話，等到校長來尋視發現我們講台灣話，他就會說：「怎們講台灣話？」，老師就趕快改用中國話說：「我們…這…個…樣…子…可以嗎？！」所以之後大家發現校長來了，就會注意要改成講中國話，那個時候就是這麼一回事。

民國三十九年我高一的時候，蔣介石有來我們學校巡視，因為當時我們花中的校長陳國鈞是他以前的保鏢，他來花蓮看陳國鈞²⁶就順便來我們學校巡視。因為陳國鈞校長沒有太太，所以蔣介石就和校長一起住在校長的宿舍裡面。蔣介石來花蓮²⁷，大概只有我們學校的人知道。當時我的音樂老師是郭子究²⁸。郭子究

26 陳國鈞(1915-?)於1949-1954年擔任花中校長，陳校長是浙江省人，大夏大學法學士，民國四年生，曾是北大的教授，國共內戰，擔任蔣中正的侍衛長，來台後，派陳國鈞擔任花中第三屆校長。資料來源：更生日報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0962094，截取時間：2018/6/26)

27 蔣中正與花蓮有很多淵源關係，第一次到花蓮是1950年11月2日，駐蹕花蓮高中校長公館，第二次是1951年12月26日再度蒞校，親提「為國育才」四字勸勉學生。蔣中正到花中共五次，另三次未公開行程。資料來源：更生日報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0962094，截取時間：2019/5/29)

28 郭子究(1919-1999)是出身臺灣屏東新園的音樂教育者，長年任教於花蓮中學。郭子究老師是相當傳奇的音樂人物，他只有國小畢業，卻憑著熱情與天賦，摸索出自己的音樂之路，並通過了中學合格教師的檢定，在花蓮中學擔任了34年的音樂老師，在音樂方面的作品及藝文活動方面的推廣，又深為地方各界的肯定，「花蓮音樂之父」是地方各界給他的讚譽。〈國立花蓮高級中學學校發展之研究〉，頁55。

老師很厲害，只有小學畢業，但是他會拉小提琴、彈鋼琴、吹小喇叭，他上課教我們唱歌還有指揮。當年蔣介石要來我們學校的時候，郭子究老師音樂課訓練的學生組了一支十二人的樂隊表演歡迎他，我是樂隊裡責吹小喇叭的人，當時我吹得還不錯，蔣介石還有走過來摸摸我的頭。

民國四十年我高二的時候，花蓮發生了一場很大的地震²⁹，當



蔣中正巡視花中與當年花中音樂老師郭子究的樂隊，從大鼓手數來前排第四位吹小喇叭者為楊總賢先生。

資料來源：更生日報

29 (民國四十年) 1951年10月至12月東台灣受到一連串地震的侵襲，自10月22日開始，地震接連不斷地發生，餘震沿著縱谷由北段之花蓮向南遷移，11月至中段之玉里地區，12月達南段的台東地區，台灣省氣象所(中央氣象局的前身)共記錄了3,037個地震，其中735個為有感地震、4個大地震($ML \geq 7.0$)，釀成85人死亡、200人重傷、1,000餘人輕傷。地震分佈長達一百多公里，同時引發米崙、玉里與池上等三條地震斷層的錯動。〈日據時期嘉南地區歷史地震資料之重新整理與分析台灣地區十大災害地震圖集〉，《台灣十大災害地震圖集》(台北：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1999)，頁208。

時死了非常多人，很多房舍也都倒塌毀損了，還好花中的建築還算是堅固，我們隔天還是可以照常去上學。陳國鈞是花中的第三任校長，浙江人。他很疼我，因為我很會畫圖，所以花蓮縣當時什麼壁報比賽、繪畫比賽啦就派我代表花中去比賽都是拿冠軍，他就很高興。他總是和我說：「楊總賢啊可惜你不會講北平話」。

學北平話很辛苦

光復以後要講中國話，漢字長的差不多，但是中國人用的漢字和日文的漢字的意思不一樣，那個時候我一下子沒有辦法理解，之後就變得亂七八糟的。

我學北平話也是從ㄅㄆㄇㄏ開始。福州的老師他會講和台灣話很像的福建話，也會講北平話。那時候看書有看福建音的漢文，例如人之初，性本善，用台灣話發音。漢字一個字一個字看得懂，但是不會唸北平話的發音。北平話我是十二歲的時候開始學，所以很困難，這是我個人的感覺，年紀大學語言很困難，不像日文和台灣話，小的時候一直聽一直聽就會講。

我自己的感覺是語言不通好像在學外國話一樣，我知道漢字的意思，一個一個字寫意思看得懂，可是像是「怎麼」這種用法在台灣話裡面沒有，應該是「啥物代誌」，「爲什麼」也是北平話的用法，台灣不會講這種話，是之後台灣話借用北平話的詞彙來的。所以北平話、福建話和台灣話有很多不一樣。

我自己很辛苦，學他們的中國話很辛苦，因為小的時候都講日語，對於日本文化接觸比較深，到現在也是一樣。日本人跟我講話他不相信我是台灣人，到現在還是一樣。

我們班上也有語言天才學不到一個月就會講了，這種人也

有。但也不一定要對語言有興趣，最好是可以跟外省人做好朋友天天在一起，北平話很快就可以學會了。

我不太會說中國話，結果都講日語，所以現在同學會也是，他們還是會笑我講日語，他們也會挖苦我：「現在還是只會講日語嗎？！」我就只會講日語而已，所以很辛苦，學中國話，很辛苦。

爸爸回來了，我們有了的新的家

我的爸爸在我初中一年級時從海南島輾轉到香港再搭船平安回到台灣。爸爸先在花蓮市買了一間房子，請一個幫傭阿姨煮飯打掃，我們兄弟都住在那邊。我每天從市區的家騎腳踏去花中上學要花十分鐘，二二八事件之後我的腳踏車被國軍沒收，我改成走路上學，走路要三十分鐘。回來花蓮之後，我爸爸一個人跑去豐田開了一家豐田病院，但是不知道是生意不好，還是他沒有醫生執照，所以政府的人勸他不要自己開業，我爸爸最後就把那家醫院收起來了。結果他被政府的人請調去富里的衛生所做所長，之後又再娶了一個護士做太太。

初中二年級的暑假，我第一次回去富里見爸爸，花中住富里的同學說：「你爸爸在富里衛生所上班，我知道在哪邊我帶你去」，結果座火車要花三個多小時³⁰。

30 1950年代初期的花東線鐵路，花蓮到台東坐汽油車最快要5小時27分，蒸汽機車則要7小時45分，客貨混合列車甚至要10小時以上，且班次不多。資料來源：林與先〈關於花東鐵路的歷史〉，頁6。（<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11/11/2011110418372246.pdf>，截取時間：2019/5/29）

寒暑假的時，我們兄弟會回去富里的家，回鄉下可以跟狗玩還可以去釣魚。我那時候很喜歡打獵，雖然只是中學生，我也有獵槍，不是成年人原本是不能拿獵槍的，但我爸爸和警察所長說要買個小的空氣槍給兒子。我爸爸在富里鄉像是大人物一樣，警察都怕他。

當時花蓮到富里的火車要坐三個小時，花蓮市和最南端的富里鄉距離一百一十公里，所以我在花蓮市都很不想回去，在花蓮市有人煮飯給我吃，又可以去游泳，去釣魚，什麼都可以做，所以很不想回去。可是爸爸打電話來說：「回來！」所以不回去不行，我們就全部的小孩一起回去富里。

花中畢業

民國四十一年八月，我高中畢業之後本來是考上師大的美術系，可是我爸爸說他當醫生我也要當醫生，所以我爸爸不讓我去讀。結果我和花中其他三個也是沒有考上大學的同學一起北上，到台北有很多補習班，我們去重考班補習準備再考一次大學。那個時候北迴鐵路只有到蘇澳，我們要先從花蓮搭公路局的鐵巴士到蘇澳再轉搭火車到台北。當時公路局的巴士走蘇花公路要八個小時才會到蘇澳³¹，路途彎彎曲曲的走的我頭好暈。到蘇澳之後還要再搭四個小時的火車才會到台北。我們也只有搭巴士和搭船到蘇澳兩種選擇，搭船風浪大，在海上搖晃容易暈船不舒服，所以我們選擇搭最便宜的巴士。

31 道路崎嶇難行，顛波不堪，行車速度不能太快，所以從花蓮到蘇澳行程要六、七小時。《花蓮講古》，〈花蓮最早的司機和車掌〉，頁 118。

到了台北之後我們四個人在東門租了一間六個榻榻米大小的房間一起住，隔年我重考考上了淡江英專，結果我爸爸還是不讓我去讀，他叫我不要考了直接去工作，而我決定先去當兵。

花中畢業離開花蓮到台北之後我和校長陳國鈞一直有保持聯絡，民國四十三年，陳國鈞校長離開花中轉到台北的行政專科學校當教授³²，在等待入伍的期間，他知道我也在台北就問我要不要去他那邊唸書，他很疼我，我不太會講北平話，他說沒關係他教我，但我還是決定要先去當兵。

民國四十五年退伍之後，藉由我爸爸的引介下我進入了新光集團底下的新光紡織工作，新光集團³³的創辦人吳火

32 1954年陳國鈞轉任臺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今國立台北大學）社會行政科教授、臺灣省立法商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兼夜間部副主任、法商學院訓導主任。政治大學邊政學系教授。後任中興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今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兼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勞工研究委員、內政部社會法規整理委員、大陸救災總會研究發展委員、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教育委員兼訓練組召集人等職。著有《臺灣土著社會始祖傳》、《臺灣土著社會研究》等。資料來源：<http://www.hgzz.net/zhuanti/72842.html>，截取時間：2018/6/26

33 源自於1945年，吳火獅與洪萬傳、林登山等人創辦新光商行，於故鄉新竹市與故人小川光定各取一字命名，經營布料與茶、糖貿易。1952年，新光商行擴大為台灣新光實業，克服時局限制，涉足人造纖維，獲利可觀，並逐步多角化經營，成為今日之新光集團。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7%81%AB%E7%8D%85>，截取時間：2018/6/26）在1957年之前，因限制新紡織廠成立之法令，予以保護，並以代紡代織，低利貸款，扶植已成立之紡織廠，吳氏為把握此工業發展之契機，以化整為零方式，將紡織機器拆成零件，再以零件進口組合，創辦新光紡織廠於新竹、苗栗等地，由布匹買賣，布料批發，躍升為織布工業，1954年，獲得日本技術之支持，多方設法尋求奧援，獲准成立「中國人造纖維公司」。這是台灣地區第一家生產人造棉及

獅³⁴是我爸爸的國小同學和兒時的玩伴，我爸爸搬到花蓮之後他們還是有再聯絡，我考不上學醫學院怎麼辦呢？老爸就說不要去考了，去新光紡織工作，他請吳火獅幫我安排了一份工作。因為當時有很多紡織技術是日文需要翻譯，所以我在新光紡織做兩年日文翻譯之後，民國四十七年被派遣到新光的大阪支部做採購的工作，在大阪時我去讀了大阪商業大學³⁵夜間部三年。

人造絲棉的公司，開拓紡織新紀元。直至1960年代中期，台灣紡織工業鼎盛時期，吳氏即以紡織工業為其主要投資及經營對象，擔任全國絲織公會理事長，成為紡織業翹楚，對台灣紡織工業之發展，貢獻良多。資料來源：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網站 (<http://www.skh.org.tw/about1.htm>，截取時間：2019/5/29)

- 34 吳火獅(1919-1986)是台灣企業家，生於新竹市東勢潭，幼時師事鄭怡堂，學習漢文。十歲入新竹第一公學校就讀，因家貧，半工半讀，幾至輟學，幸賴老師濟助完成學業，193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次年，進入台北市平野商店當學徒，日勤百務，夜則在稻江補校進修。因工作勤奮，才識過人，1931年起，擔任小川商行總經理，負責棉布批發，足跡遍台南及日本通都大邑，中日戰爭後期，經濟統制，布業尤為蕭條，吳火獅先生深明積極變通之理，小川商行遂能獨步同業。1945年，戰爭結束後，創設新光商行台北，斥資建造木殼船新光號，從事台灣與大陸間貿易。資料來源：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網站 (<http://www.skh.org.tw/about1.htm>，截取時間：2019/5/29)
- 35 是位於日本大阪府的一所私立大學。前身為1928年設置的大阪城東商業學校，1947年與交野女子專門學校合併為大阪城東大學，1952年改名為大阪商業大學。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E5%95%86%E6%A5%E6%A5%AD%E5%A4%A7%E5%AD%B8>，截取時間：2018/6/26)

六、回憶故鄉

吉野村的老鄰居

在大阪的的三年，我曾經去找以前住在吉野村的人，找了兩位以前吉野醫院的產婆，她們回日本之後還在當助產士，她們見到我，摸著我的頭就很懷念的說：「都這麼大了，以前都是我們幫你媽媽接生的。」在大阪，我會先跟以前吉野村的人聯絡，星期六的時候就趕快去東京找他們。我記得以前產婆的兒子也住在醫院的宿舍裡，我家的隔壁。當時大兒子是花中的學生，二兒子是花工的學生。當時我和弟弟們年紀還太小，他們年紀太大，我們小學，他們中學，他們理都不理我們。我們去河裡抓水蛙、田蛙，但是他們是在練習打靶，那個時候已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會帶軍帽上學，就像大人一樣，他們不會理我們，因為我們還只是流鼻涕的小鬼頭。但是我在日本和他們見面時，他們也很懷念、很驚訝，當時的小朋友都已經長這麼大了。

我也有去找清水半平先生，他住東京的中野區，他還記得我，我就住在他家一個禮拜，他不讓我走，還在一直懷念以前一些吉野村的事，半平把相片拿出來說：「看看你小時候的相片和你爸爸的相片我都有！」然後就通通拿出來給我看。

花中的老同學

花中跟我很要好的同學徐石山³⁶，日文名子是大島三文郎，

36 徐石山(1931-1998)，阿美族人，生於吉安鄉仁里村(舊稱田浦)。自明禮公學校(明治公學校)畢業後就讀花蓮中學，因參加中學籃球校隊，由教練推薦赴台北讀師範學院(台灣師範大學之前身)活躍台北籃壇。

他是阿美族人，很有名。他是全國大專十項全能體育競賽的冠軍³⁷，畢業後直接保送師大體育系。他們原住民的體能很好，很多都是可以直接用體育成績保送讀大學。他也很喜歡喝酒，我常到他家去只有阿公和阿嬤在家。他們家住在田浦³⁸，阿公阿嬤也都很愛喝酒，而且人都非常好，只是他們的衛生習慣不太好，可能沒有洗澡的習慣會臭臭的，腳都黑黑的。我們都是用日語溝通，老一輩原住民的日文雖然不太流利但是還可以溝通。

我們班唯一的外省人同學，讀了花中一年之後日文變得非常好，台灣話和客家話也會說了，罵人的台灣方言也說得特別好。同學會的時候我們都會出席，其他同學講台灣話和日語他都聽得懂，他說：「我當然聽得懂日文，聽也聽了十年了，都是聽你們在講，我聽也聽得懂你們在講什麼。」我們都很好呢，都有在聯絡。他三年前（2015年）過世了，幾十年了都跟台灣人混在一起，也娶了台灣太太是我妹妹的同學，最後就變成台灣人了。

懷念故鄉

現在同學會都沒有了，原本一年一次，但現在大家都老了，

1954-1955年接連入選大專聯隊與民生隊，並入選台灣省國光隊，參加第三屆全國介壽盃籃球賽。徐石山也是棒球投手與足球守門員。自田徑場退休後，曾擔任花蓮田徑代表教練，培養後起之秀，亦於海星中學、花蓮省立商業學校擔任體育老師多年。《吉安鄉志》，頁715-716。

37 徐石山曾代表花蓮縣參加全國運動大會，獲十項運動第一名。《吉安鄉志》，頁715-716。

38 除了七腳川社之外，還有荳蘭、薄薄及里漏等社之南勢阿美，為早期居住在吉安鄉的原住民。1937年荳蘭改為田浦，薄薄改為南埔。《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頁22、55。

沒有同學會了。我出生在花蓮，小孩子的時候，小學、初中、高中在花蓮，所有的同學也都在花蓮。我的原住民朋友很多所以我還會講一點阿美族話，我也很會講罵人的客家話，很可惜花蓮的同學很多都已經過世了。花蓮永遠都是我的故鄉，大家都很溫和也很熱情。

後記

楊總賢先生於 1958 年赴新光紡織大阪支部從事採購的工作，同時進入大阪商業大學就讀三年，返台後持續於新光紡織工作，隨後認識了擔任會計的妻子並且結婚生子。一直到 1980 年代，新光紡織因市場改變而產業外移，楊總賢先生便離職，輾轉到朋友位於台北市中山區的咖啡廳工作。在當年咖啡廳的場域中結識了許多帶日本團客的導遊，楊先生出色的日語能力因此被發掘，老導遊介紹他也投入觀光業。從事導遊工作約兩年的時間，楊總賢先生藉著優秀的語言與行銷能力受到金龍藝品店老闆的青睞，並推薦其至三普旅行社工作。

五十七歲的楊總賢先生與筆者的母親在 1990 年同期進入三普旅行社。楊先生擔任部長，接待日本的領隊、公司高級幹部與貴賓，筆者的母親則為他的部屬。作為重要客戶的導遊，楊先生也會帶他們到故鄉花蓮光觀，並且時常下榻於交通便捷價格實惠的統帥飯店。七十二歲的楊總賢先生於 2005 年從三普旅行社退休，在工作之餘也會回花蓮參加親戚的婚喪喜慶以及同學會。小學同學會是以今年辦在台灣花蓮，明年辦在日本的方式舉行，然而近十年台灣與日本的同學們漸漸凋零，同學會也就此停辦了。

最近一次回花蓮是在 2018 年 2 月 6 日地震前，筆者的母親

幫楊總賢先生於他熟悉的花蓮老飯店統帥訂房，但在地震之後統帥飯店也走入了歷史。飯店的老闆特別致電給他這個老客戶說：「統帥熄燈了，謝謝你多年來的照顧。」

楊總賢先生因身體漸漸衰老，近年來多待在家照顧妻子，同時等待兒女子孫假日回家團聚，享受家庭時光。